

“李生”·“二古”·“曼殊”： 《荆生》事件的三位关系人

夏寅

摘要 1919年2月，林纾发表短篇小说《荆生》，影射攻击北大新文化人，引起对方的反批评和文化界的广泛议论，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五四”前不久“新旧冲突”的一个重要环节。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双方几位头面人物，而相对忽视其他有关系的知识人：《荆生》中向“蠹叟”讲述故事的“李生”，在《每周评论》上攻击林纾的“二古”和“曼殊”，三人的真实身份一直不明。经考证，其分别是北大学生李濂镗、北大预科教授程演生和梁启超之弟梁启勋。三人的知识背景、参与动机和立场认同各不相同，展现了当时文化界纷繁复杂的多元状态。

关键词 《荆生》 李濂镗 程演生 梁启勋 林纾

作者夏寅，北京大学中文系博雅博士后（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07-0155-11

1919年2月4日，林纾经弟子张厚载牵线，在上海《新申报》开设了《蠹叟丛谈》短篇小说专栏，^①同月17、18日发表《荆生》一文，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北大《新青年》同人作并不隐晦的影射攻击。

此举迅速引发对方集束炸弹式的激烈讨伐，他们以主办的《每周评论》周刊为主要阵地，自3月9日第12号起，反击文字无期不有，持续月余。与此同时，一则几位北大新文化人为政府所忌将遭驱逐的传言，也在舆论场上播散开来。两事叠合，在文化界和社会层面造成巨大轰动，林纾从此不得不担当起旧派代表的角色，将所谓“新旧思潮之激战”^②演成一出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剧目。

关于《荆生》事件的前因后果和台前幕后，王风等学者已有精确妥帖的梳理。^③只是后来者出于观察角度的不同，追加粘附的阐释乃层出不穷、愈翻愈奇。然就事件本身而言，研究者多将视线集中在林纾和几位新文化巨子身上，其实下场参与的人物还有不少，身份动机各有不同。其中人事纠葛之复杂与各自立场认同之微妙，似尚未得到彻底的阐发。《荆生》中那位向“蠹叟”讲故事的“李生”，以及当时在《每周评论》上攻击林纾的“二古”和“曼殊”，三人究竟是谁，便至今未能确考，而事实上皆有“本尊”。

① 林琴南：《蠹叟丛谈（一）》，《新申报》1919年2月4日。

② 守常（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每周评论》第12号，1919年3月9日。

③ 王枫（王风）：《林纾：拼我残年 极力卫道》，载陈平原、夏晓虹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年，第304—316页。按张旭、车树昇：《林纾年谱长编（1852—1924）》（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一书叙述《荆生》事件，多有暗袭王文之处，而未予注明。

“李生”

《荆生》体裁和林纾笔下许多其他小说相近，即劈空开讲一个故事，完结时，作者以化身出现，一面述说见闻的根据，一面发表带有道德意味的议论。此系古代笔记小说常见格式，较典型者如《聊斋志异》。以往研究者多聚焦于前面的故事，探讨“荆生”一角究竟是林纾自况，还是影射徐树铮或其他武人；对于林纾化身“蠹叟”所作的总结陈词，则较少留意。这段话中，除了“蠹叟”本人，还有一位“门人李生”：

此事余闻之门人李生。李生似不满意于此三人。故矫为快意之言。以告余。余闻之颇为喟喟。……或者李生有托而言。余姑录之。以补吾丛谭之阙。^①

“荆生”出手教训田其美、狄莫和金心异的故事出于虚构，自不可能闻诸“李生”。这里或应解作“李生”不满三角色原型（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的言行主张，转告于老师林纾，促成了这篇小说的诞生。因当时林纾的交际圈与北大新派教师群体相对隔绝，他恐怕也未必有兴致找来《新青年》逐篇细读；小说却显示，他对陈、胡、钱三人的身份信息和大致主张有所了解，且区别得相当分明。他知道田其美是“皖人”，金心异是“浙人”，尽管佯称对狄莫“不知其何许人”，却知道是“新归自美洲，能哲学”的留学生。此外，他还知道陈最重孔教问题和伦理革命，胡偏于提倡白话，钱则有小学修养（“默守说文”）。最有意思的是，林纾甚至知道“金生短视”、戴眼镜，特意安排了一个“荆生”“取其眼镜掷之”的滑稽细节。

这些琐情细故，自然是某个对北大情形和新思潮动向颇为了解的人告诉他的。换句话说，“门人李生”作为消息源头的化身，应实有其人。对于这点，《新青年》同人当时便有所察觉，并加以揣测。如鲁迅化名“庚言”，在《每周评论》第15号上写道：

前次北京大学的谣言，可算是近来一大事件了。我当初也以为是迷顽可怜的老辈所为，岂知事实竟大谬不然，全是因为骂了旧戏惹出来的。主动的人，只是荆生小说里的一个李四，听说还是什么剧评家哩。^②

指的显然是常在报刊上写剧评的北大学生、居间邀请林纾开设《蠹叟丛谈》专栏的张厚载。他是林纾担任国文总教习的北京五城学堂的学生，^③也向上海《神州日报》传递过不少北大内部传闻，更因戏剧改革问题，和《新青年》同人发生过论争。鲁迅推测向“蠹叟”传话的“李生”就是张厚载，也算有一定缘由。^④

然而综观张厚载那几年间的言论，可知这一猜想并不完全合理。其实他非但不反对新文学，还拥护得颇为热烈。1918年4月，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一则《希声室杂记》，认为：

非现代之文字（即过去之文字）概可称为古文。《尚书》之文、左氏班马之文、韩柳苏王之文，皆古文也。浅人乃以古文与骈文对，以为韩昌黎作古文起八代之衰，甚至方姚诸辈，亦以桐城派古文相矜许，何所见之陋也？又古文者，陈死人之文也。吾人生存现代，又何必亟亟以摹仿古文为能事？……此文学之所以有变迁，而文学家所以有文学革命之议也。^⑤

这里不但重复了胡适持为纲领而林纾嗤之以鼻的“死活文学”论，更对林纾极为尊崇的方苞、姚鼐乃至韩愈都毫不客气，倒和《妖梦》中宣称“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的“白话学堂”颇为同调。^⑥另一方面，张厚载对伦理革命也颇有同情，曾撰文发表于《新潮》，鼓吹应当破坏腐旧的传统家庭，追求“生活独立”，“不做家庭的寄生物”。^⑦相反，林纾在专栏下接连发表《荆生》《演归氏二孝子》《李薰》等篇，自称一片拳拳之心，端为与“无家族之新学家”争“天理”、存“伦纪”。两人观念如此枘凿，张厚载后来辩称对于老师的小说，自己“不能代负其文字上之责任”，^⑧并非全无道理。

发端于1918年8月的戏剧改革论争是张厚载和《新青年》方面关系变化的转折点。他对后者的诸多文学

① 林琴南：《蠹叟丛谈（十四）荆生》，《新申报》1919年2月18日。

② 庚言（鲁迅）：《旧戏的威力》，《每周评论》第15号，1919年3月30日。

③⑧ 张聊止（张厚载）：《前辈风流——旧京感逝录之一》，《子曰丛刊》第6辑，1949年4月1日。

④ 樽本照雄也由“张三李四”的俗语而联想到张厚载，认为“将张厚载写得那么容易被人识破，是林纾的失误”。见樽本照雄：《林纾冤案事件簿》，李艳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58页。

⑤ 张厚载：《希声室杂记》，《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9日。

⑥ 林琴南：《蠹叟丛谈（四十五）妖梦》，《新申报》1919年3月20日。

⑦ 张厚载：《生活独立》，《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

改良意见皆表赞成，唯于自己钟情的旧剧有所保留，招致钱玄同等不留余地的斥骂。张厚载恶声必反，在其他报章上对钱玄同施以人身攻击，^① 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不过也应注意到，张厚载并不笼统反对所有《新青年》同人，他憎恶的主要是詈骂、轻视自己的钱玄同、刘半农和陈独秀；对于同样反对旧剧、却一再邀请自己作学理探讨的胡适，他就颇为尊敬。1918年底，胡适的母亲去世，致送赙仪的名单中就有张厚载。^② 次年2月，在那则传播总统徐世昌欲令陈独秀、陶孟和、胡适、刘半农四人辞职消息的“半谷通信”中，他甚至惋惜地说：“然陶胡两君品学优异，何至牵连在内，彼主张废弃汉文之钱玄同反得逃避于外，当局果有此种意思，诚不能不谓其失察也。”^③ 反观《荆生》《妖梦》，“伟丈夫”对田、狄、金三人一视同仁地饱以老拳；罗喉罗王也没有放过胡适的化身“秦二世”不去吞食。凡此种种，张厚载的态度皆与“不满意于此三人”的“门人李生”不符，后者当另有其人。

与张厚载同时，还有一位林纾弟子也就读于北大，并曾参与到新文学讨论中。此人名叫李濂镗（1896—1963），字杏南，直隶冀县人。^④ 1910年，他在北京五城学堂作文得到林纾赞赏，批语曰，“於菟三岁，气便食牛，此子非近器，获冠其侔”，从此对林氏“高山景行，敢佩终生”。^⑤ 后来他入学北大本科哲学门，1917年春，在京师图书馆中读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深受触动，“几为之坐不安席，食不知味”，因致函《新青年》讨论。信中写道：

镗昔肄业中学，曾著论说，大旨谓吾国文学之究竟，将为一种有文法之白话，见者辄一笑置之，目为狂背。数星期前，在某先生处讲《左传》，先生盛赞《左传》曰：“辞令之妙，古今第一。”镗又乘间语曰：“《左传》辞令，《红楼梦》中每多见之。”同堂八人，闻者又皆窃笑。不图今日迢迢数千里外，获同心焉。^⑥

这里的“某先生”，很可能就是同样欣赏《红楼梦》、认为“中国言情之说部，至《石头记》止矣”的林纾。^⑦

到此阶段，李濂镗和张厚载一样，都因胡适的文章而对新文学发生好感，接下来的发展却大不相同。数年后，李濂镗在给章士钊的信中透露了对胡适等观感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民六之岁，胡君等于百种林译中，摭其一章一句，纵情诋毁，识者笑置之。复噉牙爪，托名王静[敬]轩，佯为林师辩护，同时并刊驳难，而惹观听，所谓不信之至欺其友，镗亲见之。夫林师译书卖书，与世何争？虽函简谈说，不尽精醇，而德行文艺，至足范型后辈。今人以困学养望，其道泰迂，急于揭己，特吠高名。致使吾师暮年，抑郁而歿。^⑧

所言大抵依据事实，只是时序有些错乱。钱玄同扮演的“王敬轩”和刘半农的往来书信，登载于《新青年》1918年3月4卷3号。4月15日，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在下一期刊出，内有“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论”一句，李濂镗说早了一年。而这个语例是钱玄同在1917年11月致刘半农信中率先摘引的，只是未点出林纾的名字，并云：“此公之文，本来连盖酱缸都不配，只有用先生的法子，把他抛入垃圾桶罢了。”^⑨ 较之胡适的措辞，这才算是“纵情诋毁”。钱锺书后来指出，此句林译实作“女接所欢，嫫，而其母下之”，并无问题，反倒是钱、胡误记讹传了。^⑩

① 聊止斋（张厚载）：《对于新青年之批评》，《时事新报·学灯》1918年11月27日。

② 《马寅初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9、30日。

③ 《学海要闻（半谷通信）》，《神州日报》1919年2月26日。

④ 《国立北京大学民国九年毕业同学录》，1920年，第48页。

⑤ 李濂镗、孤桐（章士钊）：《前以》，《甲寅周刊》第1卷第16号，1925年10月31日。

⑥ “通信”之李濂镗致胡适，《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

⑦ 林纾：《佳儿佳妇序》，《申报》1916年5月31日。林纾并不一味反对白话，唯反对“尽弃古文行以白话”。他对《水浒》《红楼梦》有好评，认为白话也能“动人”。见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林纾集》第1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75—378页；林琴南：《蠡叟丛谈（四十七）妖梦》，《新申报》1919年3月22日。

⑧ 李濂镗、孤桐：《前以》，《甲寅周刊》第1卷第16号，1925年10月31日。这段话中的若干文句后被钱基博直接挪用在于《现代中国文学史》里，后有一段李濂镗“欲访所谓王静[敬]轩者而与之友”，得知真相后气愤不已的情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第441页。

⑨ 钱玄同、刘半农：《新文学与今韵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⑩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注51，《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11—112页。

其实“王敬轩”信发表一个月后，李濂镗和胡适的关系还不错。据其 4 月 12 日致胡适信，可知当日两人曾有一场愉快的晨间“小谈”，此前他还曾寄“通俗文论”给胡适“奉求正疵”。^① 只是随着钱、刘“唱双簧”的内幕在北大师生中传开，尊师重道、个性耿直强烈的李濂镗才深受刺激，^② 对胡适的态度幡然一变，数年后提起此事，犹有余愤。其实胡适私底下对钱、刘“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亦颇为不满，为此和两人闹过不愉快；^③ 而李濂镗不知，又读到胡适讥议林纾小说的句子，便认定其为主使的元凶首恶。自此，他对新文学反亲为仇，六七年后与吴宓、章士钊等新文学反对者接触，尝试开展合作，甚至曾和吴宓商量要“选辑攻诋新文学之论文，刊为一集”。^④

林纾这一时期的小说，人物多具真名实姓，甚至写明籍贯履历，讳名则往往事出有因。^⑤ 是故“门人李生”之“李”姓，很可能是实指。林纾的教育经验极为丰富，辛丑入都后，先后教过的学生不下千数，列入门墙而称弟子者亦复不少。^⑥ 写作《荆生》之时，围绕在他身边的众“门人”中，姓李的未必只有一位；然而李濂镗不但身份、年齿一致，对于北大新文化人主张的了解，对他们情感态度前后的变化，也都若合符节，正是“李生”最为可能的人选。

“二古”

新文化方面，《每周评论》1919 年 3 月 9 日第 12 号全篇转载《荆生》一文，拉开了批判林纾的序幕。下一期，该刊“通讯”栏中登出了一篇《评林蛸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以下简称《评〈荆生〉》），署名“二古”。^⑦ 林纾号畏庐，在《荆生》中以“怕死如蛸”来形容钱玄同的化身金心异，“二古”乃将“蛸”字安回到林纾身上。他表示，姑不论写作动机如何，仅从文字上看，这篇小说就不通——“其结构之平直、文法之舛谬、字句之欠妥，在在可指”。“二古”自称是个教“中文课”的“中学教师”，于批改学生文卷之暇，注出《荆生》中文字不妥之处，“以改中学校学生文章之手腕，而施之于海内所称大古文家之林先生”，暴露其“号为能文章”的虚妄，接着便是对这篇小说的逐句批点。

这种做法的用意在于釜底抽薪，通过证明对方即便在其认可信奉的价值体系内也算不得高明，瓦解他反对的资格。这一策略，《新青年》同人们早已付诸实践：钱玄同最早批评林纾“与人对译欧西小说，专用《聊斋志异》文笔，一面又欲引韩柳以自重”，自相矛盾，够不上正宗古文家的标准。^⑧ 胡适则举林氏文中“而方姚卒不之踏”一句不合语法为例，指其身作为“古文大家”，文字尚未弄通，自然更不配侈谈“古文之不当废”。^⑨ 陈独秀也说：“其实林琴南所作的笔记和所译的小说，在真正旧文学家看起来，也就不旧

① 1918 年 4 月 12 日李濂镗致胡适函，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 1176—006，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28 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 年，第 289—290 页。

② 李濂镗与吴宓于 1925 年 7 月 4 日首次会面，其后一两年间往来密切。吴宓认为李濂镗是“燕赵质直慷慨之士”，是很准确的观察。见 1925 年 7 月 4 日、1927 年 7 月 4 日吴宓日记，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 3 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 40、365 页。

③ 1918 年 8 月 20 日胡适致钱玄同函，潘光哲主编：《胡适中文书信集》第 1 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8 年，第 338 页。此信仅署“廿日”，编者未对月份作出考证。今按信中提到同月《公言报》所登宋春舫文，当为《戏剧改良评议》，刊 1918 年 8 月 17—19 日，可知此信年月。事件发生后引起的议论，见宋声泉：《被神话化的〈新青年〉“双簧戏”事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 年第 1 期。

④ 1925 年 12 月 20 日、1926 年 1 月 2 日吴宓日记，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 3 册，第 110、119 页。李濂镗与章士钊的联络，见《甲寅周刊》第 1 卷第 11、16、20 号“通讯”栏，1925 年 9 月 22 日、10 月 31 日、11 月 28 日。

⑤ 如《某生》一篇，讲“蠹叟”和一个弟子讨论“五四”后层出不穷的学生示威，该生对学生们颇有非议，“患其取忌，因讳其名”。见林琴南：《蠹叟丛谈（一百五十八）某生》《蠹叟丛谈（一百五十九）某生》，《新申报·小申报》1919 年 9 月 13、14 日。

⑥ 朱羲曹编：《林氏弟子表》，《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09—310 页。

⑦ 《每周评论》第 13 号，1919 年 3 月 16 日。

⑧ “通信”之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 3 卷第 1 号，1917 年 3 月 1 日。此说沿自乃师章太炎，例如他在 1910 年 10 月 3 日致钱玄同信中说，要挽回学生“专喜金圣叹、蒲松龄[龄]一流文字”之颓风，“但令处处有桐城派人主持风气，亦可相观而善”，同时小字注：“惟如林纾辈托名古文辞者，则不可与作缘”。见北京鲁迅博物馆编：《北京鲁迅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 9》，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年，第 281 页。

⑨ “通信”之胡适致陈独秀，《新青年》第 3 卷第 3 号，1917 年 5 月 1 日。

不雅了。”^①“二古”和他们显然一脉相承。

此外，对反对方的言论加以嘲谑性的逐段批驳，在《新青年》上也有前例，便是刘半农那篇答复“王敬轩”的长信。故尽管《每周评论》对外宣称“二古”“不是本报记者，乃是社外投稿”，^②却向来有学者认为，此文乃是《新青年》方面故技重施，化名为之。季维龙1995年出版的《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一书，即将其归在胡适名下，不知何所据而云然；近年出版的《红楼百年话沧桑》亦从此说。^③实则胡适对“双簧信”很是反感，“二古”不可能是他。王桂妹则以别号的相似为由，认为“自号‘疑古’的钱玄同”“与化名为‘二古’的中学教师难逃干系”。^④然而钱玄同以“疑古”为号，源于他在“整理国故”问题上的思考，目前已知他首次以此为名发表文字，已是《新青年》分裂后的1923年1月。^⑤此说同样缺乏可靠依据，只能算是猜想。

众所周知，《每周评论》的主要作者群与北大文科教授圈子高度重合。后一群体之中，就有一位号“二古”者，即文科预科教授程演生（1887—1955）。他是安徽怀宁人，与陈独秀同乡，两人民初曾共事于安庆的安徽高等学堂，苏曼殊是他们共同的好友。^⑥程演生号总持，又号“二古轩主人”，苏曼殊曾将这五个字刻成图章相赠。^⑦此号的来历与程演生的三位有文学才华的女性长辈有关，盖其家有座“略具台榭”的“长枫别墅”：

光緒中，有華陽曾夫人、衡陽魏夫人，先後來寄居園中。曾、魏兩夫人皆工詩賦，暇日常教誨誦詩。曾有詩集曰“古歡室”，魏有詩集曰“古幹室”。吾祖母黎太夫人耽玩文史，且與兩夫人莫逆，別後因顏所居曰“二古軒”，志不忘也。

曾夫人名懿，是清末翰林袁勵准的母亲；魏夫人则是封疆大吏魏光燾的从妹。^⑧

程演生和陈独秀都是《甲寅杂志》的作者。^⑨后者另办《新青年》后，程演生于1917年初主动写信寻求恢复联系，刊登在《新青年》2卷6号上，内云：

读报得知足下近长北京大学文科，不胜欣祝。将于文科教授，必大有改革。西方实写之潮流，可输灌以入矣。其沉溺于陈旧腐浅古典文学及桐城派者，其亦闻而兴起乎。万望鼓勇而前，勿为俗见所阻。^⑩

可知此时二人行迹稍疏，友谊仍存。对于陈独秀提倡写实主义、抨击旧文学的新动向，程演生都积极表示支持。1917年底，他便被汲引进入北大，担任文科预科讲师。^⑪不难推想，这与同一时期刘文典、刘半农等任教北大一样，应该都出于事权极大的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推荐。

“二古”在《评〈荆生〉》一文开头自述教学生活：

鄙人一中学教师也，今日适逢校中文课之期。诸生交来文卷，堆置盈案，鄙人研墨濡毫，方事改削。

其具体工作是批改学生作文，所谓“见其未安之处”，辄“信笔注之”，使学生“明乎作文之法”——这和程演生当时的教学范围、教学方式完全吻合。其时北大招生，分本科和预科，规定“投考预科者，必须中学校

① 只眼（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3月16日。钱锺书对林纾翻译小说所用的文体有所分析，指出林纾“认为翻译小说和‘古文’是截然两回事”，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用“古文”译小说（见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第92—100页）。新文化人以此指责林纾自相矛盾，多少有些文不对题。

② “通讯”之记者复林纾，《每周评论》第15号，1919年3月30日。

③ 季维龙：《胡适著译系年目录》，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8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杨胜群、李良主编，林齐模：《红楼百年话沧桑》，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1页。

④ 王桂妹：《“孝”：林纾与“五四”新青年论争的“隐性”焦点》，《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⑤ 疑古（钱玄同）：《“出人意表之外”的事》，《晨报副刊》1923年1月10日，据落款，写于同月5日。

⑥ 柳无忌：《苏曼殊及其友人》，载柳亚子编订：《苏曼殊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年，第372—373页。

⑦ 程筱峰：《关于曼殊大师》，载柳亚子、柳无忌：《苏曼殊年谱及其他》，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第90页。程筱峰是程演生的侄子。

⑧ 陈诗：《二古轩诗序》，《青鹤》第4卷第13期，1936年5月16日。1919年9月，吴虞与程演生相识，在日记中亦有所记录，而不尽准确。见1919年9月10、26日吴虞日记，《吴虞日记》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84、487—488页。

⑨ 程演生曾以“寂寞程生”的笔名，在《甲寅杂志》上发表文言小说《西泠异简记》。有研究者据此认为，《每周评论》上写白话小说的“程生”有可能就是程演生。见唐闻晓、陈旭楠：《〈每周评论〉上的作家“程生”何许人也》，《文史天地》2023年第7期。

⑩ “通信”之程演生致陈独秀，《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⑪ 《本校各科国文英文数学教员一览表》，《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职员录》，1918年2月编，第11页。

毕业”，投考本科者，“必须高等或专门学校毕业”；预科二年毕业，本科四年毕业。^①从学程上类比，大学预科大概相当于后来的高级中学。^②程演生在文科预科担任的课程为“国文”，具体来说，是隶属其下的“模范文”，^③此课程与“学术文”“文字及文法”并列。从课时来看，“模范文”似最吃重，^④大概是因为无论所习专业为何，研究成果最后都必须通过“模范文”的训练表出的缘故。程演生为此编出一部《模范文选》作为教材，选文分叙述、描写、议论三大类。他认为“向来选家选文，皆就艺术之体裁区分，或就朝代递载”，自己乃“一变从前选家面目”——“唯就文章之本体划别，以类相从，取其显豁”，能“使学者辨认为文之根本”。他“戏台里喝彩”，称这部文选具体的创意在于：

一描写之文，乃文学上最有价值之点，由叙述类拓充而出者。此种文章，欧美最为优长，而吾国时形缺乏。故本编特用提出为一类，以示重要。

一本编所选皆属散文，凡骈偶韵语之文，概不录入。

一文中段落，本编皆另行分之，意在破除明清选家，论文专事“抑扬顿挫”“擒纵呼应”“一气呵成”等诡弊。圈点只以正定句读，一扫去批评时文连圈密点之陋习。

第一条是在西方文学观念影响下，破除传统体裁畛域，用新标准重构中国文章的价值体系。二、三条显然受胡适、钱玄同等文学改良观念影响，力辟骈偶、韵律、圈点等传统格套，用分段和新式标点规范文章，矛头直指“以圈点为起发”的“桐城文家”。^⑤早在 1917 年元旦，钱玄同就受陈独秀、胡适启发，找沈尹默商量“应用文之改革”，^⑥此时终于在程演生手上付诸实施。由此看来，在新组成的文科教授群体中，程氏名声虽不及陈、胡等响亮，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的发表也极少，^⑦却同样是新文学、新思潮的忠实拥护者。

“二古”对《荆生》的批点，虽有吹毛求疵乃至人身攻击之处，言之成理的地方亦复不少，确能命中原文缺陷。如指摘“狄莫曰，吾意宜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一句之不通：

“文字”应改为“文言”。盖文字是就字之形体而言，所谓独体不可分析名曰文，诸形构成非仅一体名曰字，是也。狄之所主张废弃者，当指旧文学骈散古典诸文言之文，而欲易以国语白话之文行之耳。若废去文字，则白话之文又何所托而行之耶。此名词用来大不妥当，所以上文凡文字皆当改为文学或文章。且吾闻陈胡所排斥者，皆古文中之体制词藻，并未攻及文字，安可乱诬人。

像这样锱铢必较地抠字眼，若以新手为之，恐怕难以如此得心应手；对于一个担任“模范文”课程的专职教师来说，却是摇笔即来，毫不费力。其实钱玄同倒真是主张废灭汉字的，“二古”这里仅提“陈胡”，把他给策略性地绕过了。

《荆生》事件过后不久，“五四”学生示威爆发。身处漩涡中心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于 5 月 9 日留下一条简短启事，悄然辞职，只身离京南下。启事发表后，其中“杀君马者道旁儿”和“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二语指代不明，^⑧一时颇滋怀疑。三天后，《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了一封《文科教授程演生答学生常惠书》，对这两个典故和蔡元培的用意作了详细解释。程演生并请常惠立即“转示同学”，以释群疑。后来新潮社编辑出版《蔡子民先生言行录》，便将这封信作为启事的附录，文中插入两条蔡氏案语，^⑨显示其基本认可程演生

① 《本校招考简章（民国七年）》，《北京大学日刊》1918 年 6 月 5 日。

② 1922 年教育部颁布的“壬戌学制”规定，取消大学预科，“中学校修业年限六年，分为初高两级，一般各三年。此制度一直延续至今。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3 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806 页。

③ 《文预科第二学期课程表》，《北京大学日刊》1918 年 1 月 6 日。

④ 《国文部教授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7 年 12 月 16 日。

⑤ 程演生：《模范文选》“例言”，第 1—2 页。笔者所见的这一部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索书号 817.08-2632，无出版信息。另据该书亚东图书馆 1933 年 9 月第六版版权页，此书自 1918 年 9 月初版以来“向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四版以后改由亚东出版。笔者所见的这一部，即系北大出版部所出的前三版之一。

⑥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96 页。

⑦ 此仅就其以本名和常见字号所作的发表而言，或许尚有未发现的隐僻笔名。

⑧ 《蔡元培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 年 5 月 10 日。这版启事错字颇多，该刊同月 12 日曾作勘误，但仍有错字，故当以《蔡子民先生言行录》中的版本为准。

⑨ 蔡元培：《八年五月九日辞职出京启事》，新潮社编辑：《蔡子民先生言行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 年，第 335—337 页。

的解释。此信的落款是：“五月十日，二古白。”

如此，程演生在1919年两桩轰动性的文化事件中都留下了身影。他批点林纾的小说、笺注蔡元培的启事，固然是与三位挨骂的同事同仇敌忾、维护一校师生团结，其中恐怕也不无一时技痒、弄笔取快的成分。程演生和陈独秀一样，于旧文学浸淫极深，对文言的擅长和喜爱实远胜于白话，写作这路文字，想必颇感到游刃有余的欣悦。

“曼殊”

“二古”批点《荆生》的文章刊出后，立即吸引来一则读者通讯，刊登于《每周评论》3月23日第14号，署名“曼殊”。此人自称读“二古”文“哑然失笑”，感叹道：

二古先生。真可谓诲人不倦者矣。春光明媚。不以课余。窥其庭院。乃复濡笔以改此臭文耶。抑何其好为人师也。

显然同样看不上林纾的这篇小说，又对“二古”的“中学教师”身份信之不疑。他似乎很喜欢“二古”的滑稽笔墨，故亦来函踵事增华。

“二古”文末称曾读过林纾的名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及他种小说”，认为文笔“尚不如是”恶劣，伴问：“岂年衰才尽抑为他人贻作耶？”“曼殊”表示能解答这一困惑，并讲述了一件林纾的往事，谓其于“甲午乙未间”寓居上海陈季同家中，为妻子之亡而“郁郁寡欢”，陈季同因请共译《茶花女》，一时风行海内，从此开始了小说翻译生涯。

“曼殊”对林译《茶花女》评价很高，认为“译写情小说于悼亡时”，“宜乎有此神来之笔”。他接着批评林纾由这本书的商业成功而意识到“译小说可以致富”，后来的译作虽“汗牛充栋”，译笔却大不如前。他并且“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说《荆生》里的金心异自谓“吾性但欲得金耳”，其实正是林纾的“夫子自道”。

今按“曼殊”对林纾生平的讲述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林夫人刘琮姿病逝于光绪丁酉年（1897年）二月四日^①并非“甲午乙未间”。据黄濬记载，林纾翻译《茶花女》的合作者是王寿昌而非陈季同，地点则是在福州而非上海，系由主持船政局工程处的魏瀚促成。^②不过他因伤感夫人新丧，翻译时将自身情愫代入，增其凄婉，却实有其事，1921年曾亲告弟子李濂镗，后者又向章士钊转述：

民十秋日，谒畏庐师于永光寺。镗曰：“师译《茶花女遗事》，读之辄为流涕，询之友朋，莫不皆然。此译何若是之哀婉耶？”畏庐师曰：“译此之年，适值吾妻之死也。汝知之，吾此书风行天下。”言毕，捋须莞尔，有干霄凌云之气。^③

黄濬说《茶花女》的翻译“事在光绪丙申、丁酉间”，由此可以进一步确定为1897年丁酉。^④此事大抵林纾自以为美谈，平日无所讳言，逐渐传扬文坛。“曼殊”所记录的，便是一个变形失实的版本。

“曼殊”旧事重提，并非对《荆生》事件本身有太多意见，而是借机吐露对林纾译品文笔日下的不满。在他看来，只有全无功利考量地创作，才能不求工而自工；等到有意借此赚钱，就会玷损作品的艺术价值。他并引用美籍德裔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的话来解释两种创作的区别：

昔在美洲时。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德Hirth先生。有一尊崇中国画派之讲演。其言曰。“中国古画。大抵皆才士文人于窗明几净之间。藉此以洵写其性情。故望之但觉有一种清逸之气。令人意远。若西洋画则纯然为应世的。当其下笔布局之初。心中即自语曰。吾下月之房钱。在此画矣。及画成之后。悬而视之。谓如此一改。可多一磅。再改。可多二磅。故望之但觉得有一种金钱气”云云。（若夏德先生得见林琴南之画则亦不复为此言矣）此言真有独到处。

① 林纾：《亡室刘孺人哀辞》，《畏庐文集》，《林纾集》第1册，第96—97页。

②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九〇 林纾译西书之原始”，李吉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49页。

③ 李濂镗、孤桐：《前以》，《甲寅周刊》第1卷第16号，1925年10月31日。李濂镗此信写于同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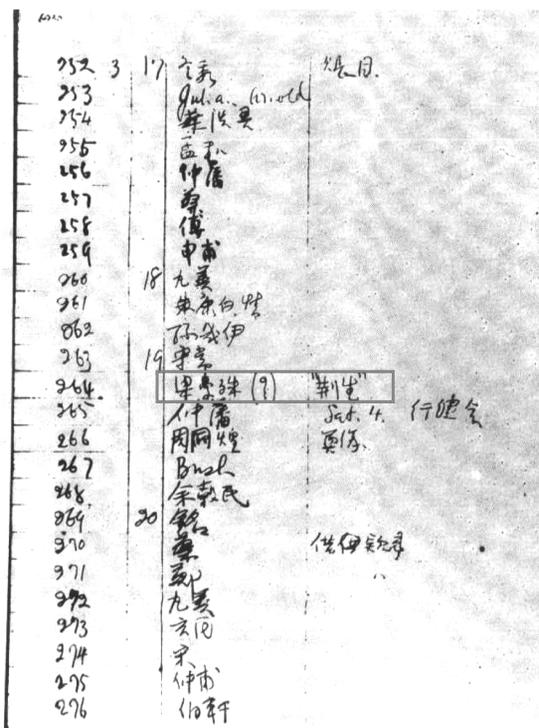
④ 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年份，曾宪辉已考证为1897年，惟未引及李濂镗此条材料。见曾宪辉：《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由此可知“曼殊”曾有游历美国的经验。他顺带提及林纾的画，指其译书之外复卖画为活，同样是“应世”的。

这篇通讯不长，内含关于作者自身的信息不多，“曼殊”究竟是谁，似未见前人考出。曾有论者信口说是苏曼殊，^①然苏氏已于前一年 5 月 2 日病逝，当然不可能是他。根据两位当时知情人留下的材料，可知来稿者应该叫“梁曼殊”。

第一位知情人是胡适。中国历史研究院“胡适档案”中有一本《来往信簿》，是对每日“收入”“寄出”信件的简要记载，起自 1918 年 8 月 21 日，止于次年 4 月 4 日。1919 年 3 月 19 日项下，人名、摘要两栏有这样一条记录：

梁曼殊 (?) | “荆生”^②



据此不难推知，议论《荆生》事件的“曼殊”来信，一开始寄到了胡适手中，且署名“梁曼殊”。胡适疑心不是真名，在后面打了个问号。

第二位知情人则是“二古”程演生。高语罕在其《白话书信》一书中引用了这篇通讯，迳称是“曼殊大师”写的。此说引起苏曼殊事迹搜集者柳亚子的怀疑，当面向程演生求证，得到的回答是：“当时一封信，乃梁曼殊所写，非出苏曼殊手。”^③奇妙的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册 1921 年 4 月再版本《白话书信》，其载有“曼殊”通讯的这页，竟有程演生留下的注记，和他告诉柳亚子的话一字不差，落款“演生志”。^④这不但确证“曼殊”姓梁，更显示程演生对《每周评论》的内情十分了解。通讯正式登载时，或许为了遵循该刊的署名惯例，将前头的“梁”字抹去了。

事实上，当时姓梁且以“曼殊”为号者确有其人，便是梁启超的二弟梁启勋（1876—1965）。两人一母

①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61 页；王桂妹：《旧派的沉默及林纾的境遇：五四新旧文化论战在 1919》，《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
 ② 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 0920—001，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14 册，第 170 页。
 ③ 柳亚子：《苏和尚杂谈》，载柳无忌编：《柳亚子文集·苏曼殊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338—339 页。
 ④ 高语罕：《白话书信》第五编“论学书信”之“一〇〇 小生给甘木的信”，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 年 4 月，第 494 页。国家图书馆藏，馆藏号 MG/H152.3/273。

步所一打
僕乃梁
曼殊所
寫非出
手
曼殊

看故曼殊大師說：

先生若不相信太炎先生底批評，我再介紹一個學者底批評給你

司馬遷，班固之言！……

爲研而祇益其醜也！與蒲松齡相次，自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

自語者

曼殊

林氏所譯之茶花女遺事，約在甲午，乙未間，當時林氏悼亡
在滬上，寓陳季同家。陳見其鬱鬱寡歡，因語之曰：「吾請與子譯
一書，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紹一名著於我國，不勝於愁眉
對坐耶？」譯寫情小說於悼亡時，正如畫家作畫於窗明椅淨間
矣，宜乎其有此神來之筆也。

迨此書一出，風行大江南北，林氏恍然大悟，知譯書之可以
致富，故此後之林譯，雖汗牛充棟，亦皆如夏德田先生所評

所生，年纪仅差三岁，都是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学生，^① 事业、学问上的影响交流最为密切。梁启勋字仲策，号“曼殊室主人”，早年曾以“曼殊”为名在兄长主办的《新小说》上发表过数则《小说丛话》，^② 有《曼殊室随笔》等著作行世。据其自述，这个斋名是丙申年（1896年）冬四川达县人吴德潇（季清、筱村、小村，1848—1900）所起：

余之曼殊室，乃光绪丙申之冬达县吴小村先生用隶体书额以名我书斋者。后有小跋，略言“曼殊”乃梵音，其义即“妙吉祥”之意云。^③

吴德潇与康有为交好，对梁氏兄弟极为爱赏。^④ 1897年任钱塘知县时，曾“拟在西湖赁一屋，购书数千金，并聘英、法文教员各一人”，使梁启超居其中，“三年而后纵之”，因黄遵宪反对而作罢。^⑤ 后知西安县，家中四十余口死于1900年的义和团事变，梁启超引以为“我生朋友中最痛恨之事”。^⑥ 林纾和他有旧，曾撰文为其诉冤。^⑦ 梁启勋感念吴氏恩义，对受赐的室名使用终身。^⑧

此外，梁启勋确有留学美国的经历。他于1903年自费留美，先读中学，1906年考入芝加哥大学为预科生，1908年升本科，“专习政治经济科”，1909年转至西北大学，1911年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同年冬天，未取

① 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载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89—195页。
② 马以钧、王学钧等对《新小说》上写《小说丛话》的“曼殊”就是梁启勋陆续有所考证，然皆未达一间 [马以钧：《〈新小说〉上的“曼殊”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王学钧：《〈小说丛话〉作者曼殊考辨》《梁启勋与晚清小说界革命》，《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4期、2006年第1期]。更有力的证据是，梁启勋在《曼殊室随笔》（南京：正中书局，1948年）“杂论·二四”条论及《金瓶梅》，并云：“三十年前，吾尝有一篇不署名之短文论此事，载于横滨之《新小说》杂志”，对应的正是《新小说》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第8号中“曼殊”所作的一条《小说丛话》。
③⑧ 梁启勋：《曼殊室随笔》“杂论·二八”，第437页。
④ 梁启超与吴德潇相识于光绪甲午年（1894年），见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饮冰室文集之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91页。
⑤ 梁启勋：《曼殊室戊辰笔记》，载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⑥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6册“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上·诗话”，第4411—4412页。
⑦ 林纾：《纪西安县知县吴公德潇全家被难事》，《畏庐文集》，《林纾集》第1册，第80—81页。一年前的三月十六日，林、吴还曾与高凤岐、邵章同游杭州九溪十八涧，见林纾：《记九溪十八涧》，《畏庐文集》，《林纾集》第1册，第77页。

得学位就回国了。^①一些介绍说他毕业于哥大,^②不确。

“曼殊”“昔在美洲时”,听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德”一场“尊崇中国画派之讲演”,此事应当就发生在梁启勋入学哥大的那一年。事实上,他对夏德这番“中西绘画比较论”印象非常深刻,多年后在《曼殊室随笔》中又复述了一遍:

尝闻诸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赫斯博士之言曰,“中国画乃一笔落纸,优劣斯定,不容更改,最足以表现个性。且中国古代之名画家,其作品大都非为营业,乃于身心闲暇窗明几净时,用以陶写性情,故能清气洋溢满纸,对之令人神往。至于西洋之油画则何如,当属稿之初,心中或自忖曰,下一月之房钱在此幅矣,迨头层工作既成之后,左立而睨之曰,如此一修改,可多卖一镑;右立而睨之曰,如此一填补,可多卖二镑。动机如此,故满纸都是混浊气,更何美之可言。”赫斯博士乃一有名之东方学者,德国产而久居于美,所言如此,虽或不无阿好,然实有独到处。^③

和“曼殊”来信中的意思、句序和措辞几乎完全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收信人胡适于 1915 年夏转学哥大后,和担任该校“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夏德过从甚密,^④夏德还是他博士学位考试的六位主试者之一。^⑤在“曼殊”通讯和《曼殊室随笔》中,其名一为“夏德 Hirth”,一为“赫斯”。笔者猜想,或许前一篇中原本也作“赫斯”,到了知晓其汉名的胡适手里,才被顺手改成了“夏德”。

梁启勋归国后,从 1913 年底起担任中国银行驻京监理官。^⑥对于 1917 年以来新文学、新思潮之兴起,暂时未见他有所评论,或可当作一个沉默的观察者。他这次投函助阵,斥《荆生》为“臭文”,责林纾以好利,除一时好事外,大约也赞同新文化阵营的说法,认为这篇小说是“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新思想的表示,^⑦产生了“打抱不平”的朴素正义感。由此亦可看出这位“小说界革命”的先行者,经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对于拿小说作谩骂影射的工具,或借助粗制滥造的翻译来牟利,^⑧皆深致不满,认为是对文学的亵渎。

结语

《荆生》文长不过千余字,发表后如掷石水中,激起层层涟漪。李濂镗、程演生和梁启勋这三位参与者都不是双方阵营的头面人物,甚至匿迹藏形于化名之后达百年之久。然而也正因如此,适可见此事在知识人群中影响之广泛微妙。

李濂镗就读于北大这所现代学术教育机构,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都是他的师长。但他更忠诚于五城学堂的老师林纾,为此很可能扮演了向后者传递消息的角色,促成其向新文化人发起挑衅。耐人寻味的是,李濂镗早年接受的教育颇为传统,他身上却体现出不少新质。初读胡适的“文学改良八事”,他不但毫无抗拒,反而认为“条条精锐,良能发人猛省”,大有“先获我心”之感;对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提倡“有文法之白话”等新文学核心观念,也都表示赞成,并与既往阅读经验相印证^⑨——其中一些,很可能就来自林纾。

① 关于梁启勋的留学经历,此处综合了《游美同学录》和 1909 年梁启超为梁启勋所拟申请官费留学补助报告中的信息,矛盾处以后者为准。见北京清华学校编:《游美同学录》,1917 年,第 86 页;《梁启超家书校注本》,胡跃生校注,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 年,第 50—51 页。哥大毕业生名录将梁启勋标记为非毕业生(non-graduates),见 *Columbia University Alumni Register 1754—1931*,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2, p. 522.

② 如李志强、段双喜为梁启勋《词学(外二种)》所作前言,见梁启勋:《词学(外二种)》,李志强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第 1 页。蔡登山《梁启勋和他的〈读史随笔〉》一文称梁氏“一九〇三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离事实更远;载梁启勋著、蔡登山编:《梁启勋读史随笔》,台北:新锐文创,2022 年,第 8 页。

③ 梁启勋:《曼殊室随笔》“杂论·九〇”,第 525 页。

④ 《胡适口述自传》第 10 章“哥伦比亚大学(1915—1917)”,张书克译,《胡适研究通讯》2018 年第 1 期。

⑤ 1917 年 5 月 27 日胡适追记日记,《胡适日记全集》第 2 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年,第 515—516 页,其中夏德之名“Friedrich”误作“Frederich”。

⑥ 《命令》,《政府公报》第 584 号,1913 年 12 月 18 日。

⑦ 记者:《想用强权压倒公理的表现》,《每周评论》第 12 号,1919 年 3 月 9 日。

⑧ 钱锺书也认为,以 1913 年译完的《离恨天》为界,林纾译笔有明显退化,从此“他对所译的作品不再欣赏,也不甚感觉兴趣,除非是博取稿费的兴趣”。见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第 90—92 页。

⑨ “通信”之李濂镗致胡适,《新青年》第 3 卷第 2 号,1917 年 4 月 1 日。

这或许意味着，新文学本来并不“全新”，旧文学也不“全旧”，双方存在着由一些基本理念的接近，相互感染、化合的可能。只是随着团体壮大，文学、伦理、思想、政治等议题相互连锁，由“新文学”扩张为“新思潮”，赞同和反对的力量俱增，为了彼此区别，主张、态度也各趋极端，终于演化为“新旧思潮之激战”。短短几年间，李濂镗由新文学拥护者转为仇敌，正是这一过程具体而微的缩影。林纾的另一位学生张厚载则试图周旋于两造，一面在北大参与新思潮，一面联络旧派人士，继续其论黄数黑的报人生活，终于失去平衡，被蔡元培驱逐出校。两位同门形成了参差的对照。

程演生与梁启勋都曾亮相于晚清文坛，虽非显要人物，然而一个与陈独秀、苏曼殊往来密切，一个深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各自隶属于一条重要的政治、文化脉络。他们不约而同卷入论争，可见从晚清到“五四”，不同的文化资源与人际线索忽分忽合、交缠纠结，情形颇为复杂。

两人攻击林纾，在人际上有内外之别，对新文学的认同程度也不一致，笔下却都流露出一股轻蔑尖薄的味道。很大程度上，这是林纾过于轻佻的启衅方式招致的恶果。此举多少有违于其所向往的“审于义而不务为轻侠，笃于道而无取于泉张”的“儒者之勇”，^①他很快也意识到不妥，试图在后续论说中加以弥补，表示自己“与此辈无仇，寸心天日可表”，“所争者天理，非闲气也”，^②但为时已晚，失去了知识界的普遍同情。其实此前不久，钱玄同等轻锐激切的主张和言说方式，曾引起张东荪、蓝公武等舆论主持者不满，《新青年》方面一时颇呈孤立之势。迨《荆生》事起，旁观者们纷纷改变态度，发言支持，甚至以此为契机展开合作，^③旧派人士边缘失语的处境则进一步恶化。

这样的事态发展恐怕出乎林纾的预料。《新青年》一边，则借助《荆生》这则“反对党送登”的“广告”^④，因势利导，转祸为福。可以说，“李生”助成了《荆生》的诞生；“二古”推波助澜，反向扩大了影响；主动赞助一篇通讯的“曼殊”，则是新文化人借机招徕到的众多同情者中，颇值得分析的一个。

(责任编辑：张曦)

“Lisheng”, “Ergu” and “Manshu”: Three Figures Involved in the “Jingsheng” Incident

XIA Yin

Abstract: Lin Shu's short story “Jingsheng” (《荆生》) launched a veiled attack on the New Culture advocates at Peking University, sparking counter-criticisms and widespread debate in the cultural sphere. The incident is widely regarded as a significant episode in the “old vs. new” cultural conflict on the ev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revious scholarship has mainly focused on prominent figures from both sides, while overlooking other intellectuals involved. Among them, the identities of three individuals have long remained obscure: “Li Sheng” (“李生”), who told the tale to “Li Sou” (蠡叟) in “Jingsheng”; “Ergu” (“二古”) and “Manshu” (“曼殊”), who criticized Lin Shu in *Weekly Review*.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em as Peking University student Li Liantang, Peking University Preparatory School professor Cheng Yansheng, and Liang Qixun, the younger brother of Liang Qichao. Their distinct intellectual backgrounds, motivations for involvement, and ideological affiliations reveal the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nature of China's cultural landscape at the time.

Key words: “Jingsheng”, Li Liantang, Cheng Yansheng, Liang Qixun, Lin Shu

① 林纾：《读〈儒行〉》，《畏庐续集》，《林纾集》第1册，第109页。

② 林琴南：《蠡叟丛谈（五十六）归氏二孝子》，《新申报》1919年4月1、2日。

③ 周月峰指出，主持《国民公报》的蓝公武、主持《时事新报》的张东荪和《新青年》方面的合作都经历过波折。蓝公武认为钱玄同“任意乱说，浅薄可厌”，张东荪则反感钱氏诉诸骂詈的论辩方式。《荆生》事起后，张东荪等“对北大新派作出了公开而及时的声援”，声明“立在新思想的一方面”。参见周月峰：《另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梁启超系”再造文明的努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47—75页。

④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星期评论纪念号》1919年10月10日。